# 大海沉箱归还记

□孙茂杰

1978年春天，我从原内长山要塞大钦守备区作训科长的职务上，调到政治学院军事教研室任教。一年后，组织上批准我爱人从内长山要塞区第二医院转调到政治学院门诊部。我立即请假从北京返回大钦岛老部队搬家。在乘船搬家出岛的大海航行中，意外发生了一场木箱沉海又回归的奇迹。

那个年代，当兵的居家设施都十分简易，没有多少可搬的私有物品。家具是配发的移交品，不能搬；我和爱人都是军人，日常穿的都是军装，从未置办什么便服。所谓“搬家”，主要是办理我爱人及两个女儿从长岛随调北京的手续，可搬的东西只有被褥和孩子们的用品，以及日常生活使用的杂物等。在作训科战友们的帮助下，很快便收拾妥当。

搬家那天，大钦守备区首长给予格外关照，特意派值班艇专程送我一家人出岛，孟生何副司令员还代表守备区首长，亲自到码头为我们送行。我站在船头，眼望着渐行渐远的大钦岛，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，心里充满了不舍。虽然从渤海海峡的一个小岛上调到首都北京是件令人兴奋的好事，但想到即将离开我服役了18年的老部队，离开栽培我成长的首长和亲如兄弟的战友，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。后来，我曾多次回岛探望，虽然物是人非，但长岛那山那礁、那海口滩头、那营房坑道、那渔村百姓，依旧让我倍感亲切，桩桩往事也清晰如昨。长岛军营那些记忆，已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值班艇驶离大钦岛、越过砣矶岛半劈山不久后，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，海面随即失去了平静。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撞击着船艇，突然一个巨浪冲上了甲板，恰巧把我的一个木箱卷入了大海，瞬间便被海浪吞没得无影无踪。我立即示意艇长放弃打捞，继续航行，不能耽误既定行程。没想到临近珍珠门时，风骤然停了，浪也慢慢平静了，船艇稳稳地驶入庙岛塘，顺利抵达蓬莱港。我在船艇驾驶室内，远远地看到我曾在作训处任参谋时的老处长、时任蓬莱守备区参谋长的王云芳老首长已在码头等候。他带来的几名战士将我的物品迅速卸船装车，送往烟台火车站办理托运。当晚，我们一家便登上了从烟台开往北京的列车。

春天的渤海海峡，有不测风云乃是常态，我亲身经历过多次，也遇到过几次风险，都化险为夷。但是，在我临别之际，突起风浪卷走了我的木箱，完全出乎意料！我想，这可能是长岛的大海要给我一家人留下的念想吧。哈哈！真是“渤海情深”啊。

我回京后得知，值班艇长已将木箱被海浪冲入大海的情况报告了守备区值班室，但他们也无可奈何，此事也搁置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大约半年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奇迹般地发生了，我那个沉入大海的木箱竟然失而复得了。

那是1979年9月初，我突然接到砣矶岛守备团值班室的电话，值班参谋说砣矶渔民在砣矶岛以南海域撒网捕鱼时，意外捞起了一个木箱。因不明箱子的来历，渔民十分警惕，连忙将木箱送到团值班室。经海水长时间的浸泡，木箱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，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查询分析，推测可能是我搬家时掉入海里的那个木箱，便给我打来电话确认。我说渔民捞到木箱的海域与我沉箱的位置比较近似，并告诉他们木箱内装有几块我特意从大钦海滩捡的球石，想带回北京做个纪念，可以开箱验证。他们确认无误后，热情地说守备区后勤部张部长近日到北京后勤学院进修，顺便把木箱给我送来。我说石头太重，携带不便，其他物品可以给我带来。就这样，沉入大海半年之久的木箱，最终回到了我的家中。

多年前我回岛时，得知长岛政府出台了禁止捡球石的规定，不由得想起当年被我放弃的那几块石头，真是后悔莫及。

几十年来，“沉箱回归”这件事，始终让我觉得非常奇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说箱里放有沉重的石头，可能致使其沉入海底，难被海流冲走，但在茫茫大海之中，一个沉睡海底半年之久的小小木箱，怎么偏偏被老部队防区内的砣矶岛渔民意外捞了上来呢？这如同大海捞针的事，为啥在我身上奇迹般地发生了呢？由于没有机会向当事渔民详细了解，这件事成了我心里一直解不开的谜。我思来想去，隐约意识到，这或许只是纯粹的偶然，也可能是大海给予的恩赐。但无论如何，大海沉箱的回归，的确是个真实又生动的巧合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。

让我深受感动的是，砣矶岛渔民捞到来历不明的海底沉箱后，凭他们古道热肠的珍贵品质，没有将其丢弃，也没有私自开箱查看，更没有占为己有自行处置，而是以高度的警惕性，毫不迟疑地送到驻军机关。这是砣矶岛军民长期实行军民联防养成的优良作风。他们守岛一条心、建岛一家人，同守共建，为镇守海防要塞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我不由得联想到长岛老友吴忠波的美文。他写道：砣矶岛军民多年来，在历次海难救助中屡创奇迹，赢得了“救命砣矶岛”之美誉并名扬四海。这使我对英勇无畏、舍己为人、真诚质朴的砣矶岛人更加充满了敬重和钦佩。

↑原政治学院行政楼

↓作者全家告别大钦岛时的留影

# 栖霞抗战四杰

□张荣起

凡是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人，常常会听到枪炮声回响在耳边。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这种感应更是不可避免。当年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，胶东人民继天福山起义打响雷神庙战役之后，也奋起投入抗日，运用各种战术打击入侵的日伪军，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此前，我在整理《栖霞革命老区发展史》“英烈模范传略”中，有四个富有传奇性的典型，印象尤为深刻。

## 最先拉起抗日武装的崔书景

卢沟桥事变之后，在栖霞第一个代表人民利益、拉起武装队伍的是崔书景。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，他就解甲归农了，但在当时，他“脱掉长衫换戎装，拿起刀枪打东洋”的壮举，是颇有传奇性的。

崔书景字春山，后改名崔福田，1897年出生于栖霞市西城镇笏山村。他幼年就读于私塾，受的是封建教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“三民主义”主张的影响及五四运动的震动下，他的思想很快和革命新潮融为一体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，崔书景在陡崖（今属西城镇）、集东沟（今属苏家店镇）等村教学，思想超前、业务出色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，群众威信很高。1934年，莱阳地下党员刘瑞亭以行医（种牛痘）为名在栖霞西部活动，发现崔书景与众不同的言行后，便有意和他接近，结果两人一拍即合。当年底，崔书景辞去教员职务，两人凑了100元钱作资本，到赵格庄村（今属苏家店镇）以开“增人寿”药铺为掩护，开展党的秘密联络活动。为了掩护更多党员作地下工作，增开宋家村（蓬莱）、潘家集（招远）两个分铺，安排了不少党员做路医，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。

1937年4月，刘瑞亭介绍崔书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目标明确，信心坚定。七七事变后，莱阳县党员王国瑞来到“增人寿”药铺，代表党组织委托崔书景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）。崔书景奉命后，首先组织吴子修（教员）、牛干臣（国民党赵格庄镇长）、潘永祜（赵格庄镇文书）、刘瑞生（教员）等人开展救亡活动。1938年春，东海区派牛绍文来“增人寿”布置扩大“民先”队伍的任务，并成立“民先”栖霞队部。崔书景按照上级“开展武装斗争”的指示，于4月份在西半县横沟村（今属寺口镇）南庙成立19人的武装队伍，这是栖霞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。恰在这时，由莱阳去黄县（今龙口市）会师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3军第9大队过境，崔书景即率队合并，编为第二中队，由庄扶吾（庄国瑞）任大队长，崔书景任副大队长。全大队有枪40余支。随后，“增人寿”药铺和当路医的革命同志也加入第9大队。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栖霞、黄县边境一带，队员发展到90余人、枪械80多支，有力地遏制了顽固势力的骚扰活动，安定了地方秩序。同年秋，第9大队改编为第24大队（即后来的第5支队63团），崔书景奉蓬黄战区指挥部指示，回栖霞组建第6大队并任大队长，孙伽俐任政委。至秋季，第6大队在蓬莱县马家村改称胶东独立一营，崔书景任营长，庄扶吾任政委。

1940年初，日伪军刘桂堂部到黄县（今龙口市）“扫荡”，八路军后方司令部撤出黄县，崔书景任黄县第一行署主任兼第一纵队队长。其间，崔书景又奉蓬黄掖办事处曹漫之之命，到栖霞、招远一带开展行政与武装工作，为栖霞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扫清了障碍。同年4月24日，抗日民主政府在林家村（今属苏家店镇）成立。

几年来，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条件下，崔书景风餐露宿，为建立和发展抗日队伍不遗余力，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正义之人，把他看成革命的斗士；敌人却把他当成致命的克星。

在栖霞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后的5月31日，盘踞栖霞城的300多名日伪军突袭笏山村，抄了崔书景的家，抓走5名家人，洗劫了牲畜、鸡、鸭等一切财物。崔书景的妻子和4个儿女被羁押于日伪栖霞监狱内，家中还有2个不满10岁的孩子无人照顾。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，他发誓：“困难再大，也不能动摇我的抗日决心。”

因为栖霞武装力量相对薄弱，胶东行署派崔书景任栖霞第一行署主任，以武装推动行政工作。招远毕郭，栖霞一、二、九区是他经常活动的范围。他走到哪里，都会带起一批持枪抗日保家的人。然而，由于常年奔波、忘我操劳，他积劳成疾，不得不离开火热的革命斗争战线。从1942年到1944年，他在后泊子村（今属苏家店镇）养病2年，1945年复员，被上级安置到黄城镇（今属龙口市）南涧村为农。晚年，崔书景改名崔福田，在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1967年病逝，享年70周岁，生前留下了5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。

## 被称为“宋大胆”的抗日虎将

抗日战争时期，栖霞有个“宋大胆”，犹如海阳的于化虎。不同的是，于化虎靠的是八面开花的“铁西瓜”，“宋大胆”出名靠的是百发百中的大肚匣子和“长把梨”（手榴弹）。

“宋大胆”原名宋天德（1906年—2004年），栖霞市观里镇南埠村人。抗战时期他还是个楞头小伙子，在县大队当侦查员，因为胆子大、神出鬼没、弹无虚发，人们誉称他为“宋大天”，慢慢演变成了“宋大胆”。“宋大胆”打鬼子的传奇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三次。

一次是1940年秋的一天，为了端掉观里村西鬼子的一座碉堡，他领命去摸清碉堡里的情况。他先装扮成赶集的农民，在观里集上和多名乡亲接了头，弄清碉堡里住着二十几个鬼子，加上80多个二鬼子，共计百十号人。接着他闪进碉堡附近的一座梨园里。园主周明文是“宋大胆”的老熟人，碉堡里的装备和防御情况全装在他的脑子里。熟人见面无须客套，周明文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倒给了“宋大胆”。两人正说到兴头上，被外出抢劫归来的敌人发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“宋大胆”与周明文立马闪进旁边的梨园小屋，顺手关上门。鬼子呼啦一下围上来，领头的鬼子率先撞门，“宋大胆”从门缝看了个一清二楚。他先发制人，倏地将门一拉，当胸一枪，结果了鬼子的性命。还没等其他鬼子回过神来，他接着左右开弓，把两旁的鬼子也结果了性命。这时，一个鬼子扔来一个手榴弹，未等爆炸，他顺手抓起向敌群扔去，另一手顺势拉起周明文冲出梨园。当敌人回过神来，他们早已消失在青纱帐里。

另一次是1943年春，驻守栖霞的日伪军为了打通从杨础到蛇窝泊的交通线，在孙家坡筑起三个三角形的大炮楼，“宋大胆”领命拔除这个眼中钉。他和100名民工摸黑扛着铁锨，带着火油填平白天挖的封锁沟，拆除并烧毁炮楼墙。日伪军不肯罢休，调集3个排的兵力和4挺手提式机枪，日夜轮流把守，加紧修复。“宋大胆”又携14名精干队员化装成民工，手持大肚匣子，腰里掖着4枚手榴弹，并安排2人每人拎一只装有10枚手榴弹的饭篓，装作送饭的进了施工现场。不料15个人被安排在好几个地点。他与大老苗等4人到石场扛石头，石场外有两个身背手提式武器的伪军站岗。进入石场后，他用目光示意大老苗等人。一出石场，他先靠近一个伪军，掏出大肚匣子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那个伪军应声倒地。接着他与大老苗掏出手榴弹，“吭吭”两下，将另一个二鬼子撂倒在地，夺过两支手提式机枪，随即打出手榴弹，趁伪军和民工大乱之际，迅速返回。“宋大胆”巧毁炮楼的消息登上了报纸，很快传遍胶东各个游击战场。

还有一次是1942年7月，“宋大胆”等4人留守县委机关驻地。一天天刚亮，站了一夜岗的“宋大胆”正想休息，忽然听说有一个连的日伪军快到村头了。情况十分危急，“宋大胆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吩咐另3名队员保护机关人员转移，自己手持大肚匣子，独立阻击敌人。

他走出村口，一面向敌人主动射击，一面抄近路向北山撤离，边打边退，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身。他爬上山头后，抡起大肚匣子，左一梭右一梭，间或甩出一个手榴弹，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。过了一会儿，有20多个二鬼子一齐站起向他冲过来，他沉着迎战。当敌人靠近他时，他突然加大火力，并连续甩出几个手榴弹，直打得敌人哇哇直叫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只得撤退回去。“宋大胆”周旋一会后，估计县委机关转移得差不多了，才放心追赶队伍去了。

“宋大胆”打完鬼子打老蒋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1950年，他转业到地方，当了多年基层领导，2004年11月4日病逝，享年98岁。

## 人称“小诸葛”的苗雨村

“苗雨村”，听起来像村名，也一度被叫成村名，实际上却不是村名。这个村叫苗家沟，坐落于栖霞境内海拔814米的艾山脚下。之所以会被认为是村名，是因为村里出了一员抗战儒将叫苗雨村。

苗雨村又名苗培之，1913年出生，高小毕业后考入栖霞县立中学，1934年到青州乡师就读。就读期间，他阅读了《资本论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书籍，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。他以《不做亡国奴，坚决抵抗到底》为题，写了一篇作文，深深地打动了老师和同学，被老师张贴在学校壁报栏上，很快引起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，发展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）。从此他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国宣传活动，成为“民先”的骨干分子。1937年乡师毕业后，他受组织安排，到威海中学任教员、教导主任，暗地里进行抗日宣传，发展“民先”组织。

1937年2月13日，经中共北方局批准，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由烟台迁到威海。1938年1月16日，苗雨村根据胶东特委指示，与张锋、曹漫之、张修己、孙端夫等100余人齐集威海城里，在理琪的组织与指挥下，成功举行了威海起义，旋即又发动了荣成埠柳学校武装起义。两支起义队伍被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8大队，苗雨村任政委，参加了2月13日克复牟平城和震动胶东的雷神庙战斗。同年秋，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。不久，苗雨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先后担任61团1营3连政治指导员、八大队政委、《军人周报》主编等职。1939年5月，苗雨村所在的61团1营与64团一营强攻驻守栖霞古镇都的1000多名敌兵，首战告捷。5月26日，苗雨村所在的部队增援攻打莱阳城的友军，经过一夜鏖战，驱敌出城，猛追穷寇，大获全胜。

1939年9月，五支队改编为五旅，苗雨村相继担任政治部副秘书长、秘书长，协助首长处理日常事务，并出谋划策，成为首长的智囊之一，一度有“小诸葛”之称。

1940年，苗雨村任5旅14团政治处主任、团副政委。在反投降期间，该团指战员情绪高涨、作战勇猛、战斗力强，与苗雨村杰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此后两年多内，苗雨村所率之部屡战屡胜，击毙之敌、缴械之武器，不可胜数。1941年11月28日，苗雨村与副团长王奎先、政委雨晴率部迎战一股扫荡的日伪军，政委雨晴在激战中不幸阵亡，苗雨村出任代政委。

战后，15团在牙山整训后，苗雨村任政委，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萧镜海兼任团长，提升3营营长夏侯苏民为副团长。2营对留牙山进行反“扫荡”，苗雨村奉命带领一部，配合13团拔除栖霞城南二十里铺的鬼子据点，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烈慰问和支援。经过一夜激战，顺利告捷，打通了东、西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。1942年5月17日，苗雨村马不停蹄，配合13团攻打龙虎山，激战4小时攻下12座碉堡，全歼盘踞之顽敌，随后挥师南下，包围盘踞莱阳万第的赵保原老巢，歼敌300余名。接着，苗雨村奉命继续西进，苦战数月，所向披靡，使南海地委、行署很快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空间。

在胜利捷报频传的同时，苗雨村在5支队政治部主编《军人周报》，图文并茂，曾有军旅作家、画师之称。这样一位常胜儒将，却在1942年8月20日拔除平度城西楼子庄据点的战斗中，被暗藏身边的日本特务推下壕沟浮桥，壮烈牺牲。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决定，将苗家沟所在的大榆庄区改称雨村区。2020年9月2日，苗雨村被国家公布为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。

## 不让须眉的吴胜令

在栖霞的县志和政协文史委编撰的《文史资料》里，都有吴胜令的事迹记载，当地作家还把她的事迹编成吕剧《岗山英雄》。可见她“不让须眉，巾帼一杰”，名不虚传。

吴胜令（1904年—1985年），观里镇吴家泊村人，自幼家贫。16岁那年，父母因霍乱病双亡，她与弟妹一起被本家婶子收养，17岁嫁给郭姓人家，故有“郭大娘”之称。她思想进步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，1940年当选为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选为村妇救会主任，积极开展党的各项革命工作。其中，传递情报是她常年坚持执行的一项任务。同年，孙家洼村建立了党的秘密情报站，吴胜令担任情报员，负责栖霞、莱阳、招远一带的情报传递。当时，日伪军的岗哨封锁很严，她常把几个孩子锁在家里，不分冬夏黑白，风雨无阻地去完成传递任务。一次，她接到重要情报，要迅速、安全地送到8里外的栾家店村。当她走到八甲府村南时，有两个二鬼子从斜面截堵过来。她急中生智，从鞋子里取出情报，藏进发髻，向路旁的一座新坟奔去，放下肘弯的篮子，趴下就哭“妈”。伪军见状骂咧咧地离去，她顺利地将情报送到了目的地。

1942年，日伪军三天两头下乡“扫荡”，村指导员动员党员到观里集散发传单，震慑瓦解敌人。吴胜令接到任务后，连夜将180张传单缝在一件宽厚夹袄的袖筒和内兜里。第二天，她趁赶集混在人流里，先后到粮米市、蔬菜市、牲口市、杂品市等摊点，在与卖主讨价还价的瞬间将传单一撒而光，很快把“日寇很快完蛋”“当汉奸决无好下场”的口号传播到广大民众中，引起了日伪军的恼恨和恐慌。除此之外，吴胜令还利用晚上把传单张贴在人行道旁的大树和墙壁上。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，吴胜令到北照村贴传单。刚一进村，狗就叫起来，她急忙脱下木底鞋，赤着脚把传单贴遍了大街小巷，脚冻麻木了，她也全然不顾。过河时，她的脚背被芦苇根刺破，鲜血直流。她咬紧牙，用裹腿带子绑紧伤口，坚持把剩下的传单贴完才回家。不久，吴胜令到胶东区党委干训班学习了3个月，之后被提升为三区妇救会主任。她不顾个人安危，走村串巷、组织妇女支前、动员青年参军，并亲自将两个儿子送往前线。其丈夫被日军杀害后，家中剩下两个幼子没人照顾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她十分心痛，但从未影响支前活动。

1943年秋，为了消灭观里据点的日伪军，县委和县大队定下引蛇出洞之计，先由吴胜令通过内线给据点送了个假情报，谎称有一支八路军隐藏在岗山上。日伪军信以为真，调集兵力进行合围。其实，县委和县大队早已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在预定地点设伏，还在日伪军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一个大坑，埋上了特大号的地雷，等待鬼子来踩。吴胜令随部队隐蔽在岗山后坡。9点左右，骑马的日军头目在前面带路，观里、杨础等几个据点的日伪军直接向岗山扑来。离设伏地段越来越近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特号地雷开花了，炸得敌军人仰马翻、血肉横飞。设伏的部队一齐开火，打得敌军蒙头转向、四处乱窜、伤亡惨重。这时，他们才知中了八路军的计，立刻组织人力反扑。在这次反扑中，我方损失惨重，吴胜令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。她背着伤员下山，没走多远，右腿就中了敌人一枪，鲜血直流。她不顾一切，将伤员背出3里多地，才在村里找到了一副担架，把伤员送到了军区卫生所。她与伤员同时在卫生所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康复。

1947年，吴胜令的大儿子郭守全在三合山战斗中英勇牺牲，二儿子郭守仙受重伤住院。首长怕老人接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，迟迟不肯把消息告知来部队看儿子的郭大娘，但郭大娘却出人意料地说：“守全是我生的，是党把他培养成人，他为党和国家牺牲、为咱老百姓牺牲，值了！”

在栖霞，只要提起“郭大娘”这个名字，人人交口称赞，说她是一面旗帜，是女中豪杰，是全栖霞的榜样！

1985年8月，郭大娘在蓬莱城东关村病逝，享年81岁。